

# 白话三略

宫玉振  
编著

时事出版社

2  
2

# 白话三略

宫玉振 著

时事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白话三略/宫玉振著. —北京:时事出版社,1997  
ISBN 7-80009-449-9

I. 白… II. 宫… III. 三略-译文 IV. E892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4862 号

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:100081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68 千字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 册 定价: 11.80 元

# 前 言

《三略》的成书年代、思想特色及其谋略价值

## 一、《三略》的成书年代

《三略》，又名《黄石公三略》，是中国古代一部列入《武经七书》的经典性兵书。它的作者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认为是下邳神人：“《黄石公三略》三卷，下邳神人撰。”所谓的下邳神人，就是授张良兵书的那位黄石公。司马迁的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秦朝末年，出身于韩国贵族的张良，为了报亡国之仇，收买了一名刺客，准备在博浪沙击杀巡行中的秦始皇，不料刺客的铁槌误中了秦始皇的副车。张良行刺未遂，被迫隐姓埋名，流亡下邳（今江苏省邳州市）。有一天，张良信步来到下邳的一座桥上。这时，走来了一位身穿粗布麻衣的老人。老人到了张良跟前，将自己的鞋子一下子甩到桥下，很不礼貌地对张

良说：“小子，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！”张良愕然地看着老人，心想这个老人太不懂事理了，继而一看，老人确实已经上了年纪，不好与他计较，便强忍着火气，下桥给老人把鞋捡了上来。老人不但不道谢，反而把脚一伸，又说：“给我把鞋穿上！”张良感到又可气，又可笑，心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，干脆再替他穿上得了，于是又跪着给老人穿上了鞋子。老人一句话未说，笑咪咪地走开了。张良很吃惊，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老人远去。老人走了一里多地，又返了回来，对张良说：“小子，看来你还是可以受教的！五天后天亮时，仍然到这个地方来见我。”张良意识到老人并不是个一般的人，便跪下回答说：“是。”五天后天亮时，张良来到桥上，老人已经先到了。一见张良，老人便生气地说：“约好了与老人见面，却迟到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说完扭头便走，扔下一句话：“五天后早点来！”五天之后，鸡刚报晓，张良就赶到了桥上，不料又是老人先等在了桥头。老人说：“又落在我后面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五天后早点来！”又过了五天，还未到半夜，张良便来到了桥头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也来了。见到张良，老人高兴地说：“对，就应当这样嘛！”便从袖中拿出一部书，交给张良，说道：“读了这部书，你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。再过十年，你就会成功了。十三年后，你我将在济北见面，谷城山下的黄石，就是我。”说完老人便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天亮之

后，张良打开那部书一看，原来是一部兵书，名叫《太公兵法》。张良很珍视这部兵书，时常诵读体会，后来真的辅佐刘邦成就了帝业。十三年后，张良跟随刘邦过济北，果然在谷城山下看到了黄石，于是将黄石取回，恭敬地供奉起来。张良去世前，遗命家人一定要把黄石与自己一起下葬。家人依言而行，每逢祭祀时，连黄石也一起祭祀。后来，人们就把那位不知姓名的授书老人，尊称为黄石公。

从《史记》的这段记载，我们知道，黄石公授给张良的兵书，名为《太公兵法》，而不是《三略》。太公，指周初开国功臣姜尚，习称姜太公。姜尚是一个极富谋略的军事家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中说：“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，皆宗太公为本谋。”所谓的《太公兵法》，当是后人假托姜尚的名义而撰成的兵书，包括流传至今的《六韬》等。

一个说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《三略》，一个说是《太公兵法》。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？显然，其中的关键是《三略》与《太公兵法》之间的关系。《唐李问对》的作者提出一种观点，认为《三略》与《六韬》一样，同属于《太公兵法》：“张良所学，太公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是也。”宋代施子美在《三略讲义》中进一步解释说：“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，本《太公兵法》，而谓之《黄石公三略》者，按前汉张子房受书之事，老人指谷城山下黄石以为己，而其所授之书，乃《太公兵法》，

后世因而谓之《黄石公三略》，亦如《诗》本夫子所删也，后世谓之《毛诗》，以其出于毛萁之所训也。《黄石公三略》，其此意欤？”

将《三略》视为是《太公兵法》的一种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《史记》记载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歧异。但新的问题在于，为什么同为黄石公所授的《太公兵法》，《三略》被后世冠上了《黄石公三略》之称，而《六韬》却没有人称《黄石公六韬》呢？施子美显然是回避了这个问题。明代刘寅在《三略直解》中提出了一个假设：《三略》属于《太公兵法》，但《三略》可能经过了黄石公的推演，所以被后世冠以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名称。刘寅引经据典，做了一段很长的分析：“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，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，并不言有《三略》；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，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种，共五十三家，而《三略》亦不载焉。史称张良少匿下邳，与父老遇于圯桥，出书一编，曰：‘读此书则为王者师。’遂去。旦日视之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《通鉴纲目》亦曰：张良与沛公遇于留，良数以《太公兵法》说沛公，公善用之，常用其策。与他人言，辄不省。良曰：沛公殆天授。遂不去。《正义》曰：《七录》云《太公兵法》一帙三卷。唐李靖亦云：张良所学，太公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是也。然则《三略》本太公书，而黄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，所以兵

家者流，至今因以为黄石公书也。”这个假设是很能自圆其说的。张居正接受了这一个观点，并进一步认为，黄石公所推演的，主要是《下略》：“《三略》，本太公书，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。……其言本道德而不用阴谋诡计。《上略》所引皆曰《军讖》，《中略》皆曰《军势》，《下略》独无所引，而自言也。”清代朱墉在《三略汇解》中的观点，与张居正基本是一致的。

然而，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任何史料的佐证，因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精致的假设而已。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，判定《三略》的作者及成书时代，必须分析《三略》本身的内容。而一旦对《三略》本身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，《三略》绝对不可能是秦汉以前的作品。明代的王阳明便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。在手批《武经七书》中，王阳明说：“旧题黄石公撰，即圯上老人授张良者。文义不古，非秦汉以前书，疑为后人伪托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·黄石公三略提要》也持相同的观点。许保林先生在《黄石公三略浅说》的序言中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，进一步证明《三略》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许著读一下。

既然《三略》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，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出自黄石公之手了。那么，《三略》究竟成书于何时呢？

《三略》的名字，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。文学家陈



琳在《武军赋》中有“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之术”的说法，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《三略》的最早记载。曹魏时李康《运命论》复称“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《三略》之说。”显然，第一步我们可以划定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，就是《三略》成书不早于秦汉之际，不晚于东汉末年。

范曄《后汉书·臧宫传》中保存了一段史料，对于推定《三略》的成书年代极有价值。《臧宫传》记载：建武二十七年，臧宫与马武上书请击匈奴，光武帝“诏报曰：《黄石公记》曰：‘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柔者德也，刚者贼也。弱者仁之助也，强者怨之归也。故曰：有德之君，以所乐乐人；无德之君，以所乐乐身。乐人者其乐长，乐身者不久而亡，舍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舍远谋近者，逸而有终。逸政多忠臣，劳政多乱人。故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。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’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慌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事边外乎？”光武帝诏书中所引的《黄石公记》的这段文字，分别出于《三略》的《上略》与《下略》，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出入。这就提示我们：《黄石公记》与《黄石公三略》其实是一本书的不同名字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：《三略》在东汉初年光武帝时便已经流传于世了。而《三略》的成书，显然要更早一些。换句话说，《三略》的成书只能在西汉年间。

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，《三略》成书的时间，可以定为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期间。主要根据是《三略·中略》的一句话：“是故《三略》为衰世作。”这句话透露出撰写《三略》的时代是衰乱之世，具体来说，就是汉世衰微、王莽篡汉的时代。这种观点恐怕不是十分妥当。第一，王莽篡汉与光武中兴之间的时间是非常短的，而一部兵书从成书到流传、到产生较大影响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王莽篡汉到光武中兴的这段时间显然不足以使《三略》在社会中一下子享有如此地位；第二，《三略》所说的“衰世”，从《三略》“皇——帝——王——霸”的历史图式来看，是泛指“王泽竭”以后的时代，具体来说，指的是东周以后礼崩乐坏、王道不行的时代。这一点在《中略》中可以看的很清楚。认为《三略》所说的“衰世”便是特指王莽篡汉，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，实际没有把握“衰世”的真实含义。因此严格地说，我们现在只能断定《三略》产生于西汉年间。至于是产生于西汉初期、中期抑或晚期，则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新的材料的出现，尤其是考古方面的发现了。

那么，《三略》与黄石公、张良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我们说，没有关系，又有关系。说没有关系，是说《三略》的作者绝非黄石公，也绝非张良所受的兵书；说有关系，是说《三略》很大程度上是对张良事迹及谋略的总结与理论概括。张良是“王者师”，《三略》所

追求的正是“为帝王师”；张良善长谋略，《三略》的主题正是谋略；张良是一位深通进退之道的哲人，《三略》所反复致意的正是“全功保身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张良是一位黄老式的人物，而《三略》所弥漫全书的正是黄老精神。由此可见，《三略》的作者，必然是一位对张良的事迹与思想都很有研究的哲人。后人谈起《三略》往往联系到张良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## 二、《三略》的思想特色

与先秦的兵书相比，《三略》具有两个鲜明的思想特色。第一，从哲学属性上来说，《三略》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；第二，从时代属性上来说，《三略》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。

黄老学派，是从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一个思想流派。它始于战国中期，盛于汉朝初年。从本质上来讲，它仍然属于道家的范围，但是与先秦以《老子》为代表的道家却有了很大差别。《老子》的特点是“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”，“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”。而黄老学派，按司马谈的说法，是“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”，也就是在道家哲学的基础上，吸收阴阳家、法家、儒家、墨家等学派的一些思想，形成了一个“兼儒墨，合名法”、“讲论道德，总统仁义”的思想体系。它一方面继承了先秦道家的道论思

想，一方面又扬弃了先秦道家的消极倾向，将消极的“无为”理论转换为一种积极的“无为”理论。它强调“以虚为本，以因循为用”，强调“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”，以达到“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”的效果。

成书于西汉的《三略》，从哲学属性上来讲，带有明显的黄老特色。具体来说，在《三略》中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，阴阳家思想、法家思想及儒家思想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兵学体系。

### 1. 道家思想

《三略》最集中阐述道家思想的是《上略》的开头部分，如“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柔者德也，刚者贼也。弱者人之所助，强者怨之所攻。柔有所设，刚有所施，弱有所用，强有所加。兼此四者而制其宜”；如“莫不贪强，鲜能守微。若能守微，乃保其生”；如“能柔能刚，其国弥光。能弱能强，其国弥彰。纯柔纯弱，其国必削。纯刚纯强，其国必亡”等。其意义在于，通过“刚”“柔”这对范畴的分析，为全书确立了“尚柔”的谋略起点。

### 2. 阴阳家思想

阴阳家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《上略》“端末未见，人莫能知。天地神明，与物推移，变动无常。因敌转化，不为事先，动而辄随”一节中，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“因”字，它为《三略》确立了“贵因”的谋略原则。

### 3. 法家思想

法家思想在上、中、下三略中都有反映。《上略》中，如：“将之所以为威者，号令也；战之所以全胜者，军政也；士之所以轻战者，用命也。故将无还令，赏罚必信。如天如地，乃可御人。士卒用命，乃可越境。”“兵老则将威不行，将无威则士从轻刑，士从轻刑则军失伍，军失伍则士卒逃亡，士卒逃亡则敌乘利，敌乘利则军必丧。”“军以赏为表，以罚为里。赏罚明，则将威行；官人得，则士卒服；所任贤，则敌国震。”《中略》如：“霸者，制士以权，结士以信，使士以赏。信衰则士疏，赏亏则士不用命。”“（主）不可以无威，无威则失权。”等。《下略》如：“夫命失则令不行，令不行则政不正，政不正则道不通，道不通则邪臣胜，邪臣胜则主威伤。”“一令逆则百令失，一恶施则百恶结。故善施于顺民，恶加于凶民，则令行而无怨。”其意义在于通过对“赏罚号令”的阐述，确定了《三略》治军的一般原则。

### 4. 儒家思想

儒家思想在《三略》尤其是《下略》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。《上略》如：“夫为国之道，恃贤与民。”“下下者，务耕桑，不夺其时；薄赋敛，不匮其财；罕徭役，不使其劳。”“良将之统军也，恕己而治人。”《下略》如：“泽及于民，则贤人归之；泽及昆虫，则圣人归之。贤人所归，则其国强；圣人所归，则六合

同。”“贤人之政，降人以体。圣人之政，降人以心。”“降体以礼，降心以乐。”“有德之君，以乐乐人。无德之君，以乐乐身。乐人者，久而长。乐身者，不久而亡。”“舍己而教人者逆，正己而化人者顺。逆者乱之招，顺者治之要。”等等。通过对“礼乐教化”的弘扬，儒家思想为《三略》确立了治天下的一般原则。

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，各家在《三略》中不是相互孤立的，而是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了《三略》的思想体系。在《三略》中“道”、“德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是“五者一体”的，是“不可无一”的；“皇道”、“帝道”、“王道”、“霸道”是兼论的，是互相包容的。以道家谋略取天下，以法家原则理将卒，以儒家思想治天下，便是《三略》的全部内容。而统摄全书的，则是道家的道论。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，《三略》是一部典型的黄老兵学著作。

从时代属性上来说，《三略》又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。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。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，《三略》正是时代需要的产物。《孙子兵法》是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争的产物，也是为诸侯争霸服务的，因而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公开宣称的是“廓地分利”，是“伐大国”；《孙臆兵法》是战国中期列国兼并战争的产物，也是为列国兼并服务的，因而孙臆强调的是“战胜而强立”，强调的是“必攻不守”；成书于战国晚期、

为统一战争服务的《六韬》，则是以如何“得天下”为中心的。西汉时期，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已经建立，因而《三略》所关注的问题，既是总结“取天下”的经验，更是探讨“安天下”、“治天下”的原则。时代需求的不同，使《三略》带有明显不同于先秦兵书的时代特色。例如在战争目的上，《三略》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“诛暴讨乱”；在价值趋向上，《三略》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“释远谋近”；在君主处理与将帅的关系上，《三略》强调的是“夺其威，废其权”；在“战胜”与“国安”的关系上，《三略》既重视如何“胜可全”，更重视如何“天下宁”……凡此等等，都说明《三略》是一部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而出现的兵书。

### 三、《三略》的谋略价值

《三略》问世之后，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。光武帝诏书中引用《三略》内容，说明《三略》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。东汉末年陈琳在《武军赋》中已经将《三略》与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六韬》相提并论。唐朝初年魏征将《三略》内容收入《群书治要》，做为帝王治国安邦的参考。宋代元丰年间，《三略》被列为“武经”之一，从此取得了兵学经典的地位。《三略》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。唐朝年间，《三略》传入日本。

日本的战国时代,《三略》与《六韬》一起还被定为武校的主要教科书。同时,《三略》在朝鲜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传播。

宋人戴少望在《将鉴论断》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,惟《三略》最通于道而适于用。”那么,《三略》的谋略价值主要在什么地方呢?对于一般人来说,《三略》能从人生智慧方面给我们哪些启示呢?笔者认为,有以下三个原则是应当把握的。

第一,刚柔兼济原则。刚柔是反映事物属性的一对范畴。从刚柔的角度来说,所有的谋略不外乎可以分为三种情况:以尚刚为特征的谋略,以尚柔为特征的谋略,以刚柔兼济为特征的谋略。在《三略》看来,纯刚则易折,纯柔则不立。“柔”、“弱”、“刚”、“强”这四者,关键是“兼此四者而制其宜”。兼,强调的是刚柔兼济;宜,强调的是恰到好处。就处世智慧而言,刚也好,柔也好,强也好,弱也好,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,都不是绝对的。或先刚后柔,或先柔后刚;或外柔内刚,或外刚内柔。只有能刚能柔,能弱能强,才会左右逢源,进退自如。纯刚纯柔、纯强纯弱,都是缺乏灵活性、缺乏应变能力的表现,是根本谈不上智慧二字的。真正的智慧,就在于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完美结合。真正的成熟,也就在于刚与柔的恰到好处的运用。

第二,顺应时势原则。《三略》认为,“端末未见,



人莫能知。天地神明，与物推移。变动无常，因敌转化。不为事先，动而辄随。”这实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，就是顺应时势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古人对于时势是非常重视的。战国年间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曾经说：“失权藉者，万物之率（帅）也；而时势者，百事之长也。故无权藉、倍（背）时事而能成事者寡矣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圣人做事，必须顺应时势，因时而动。权变是万物的先行，时势是百事的主宰。所以抛弃权变、逆背时势而能成大事的几乎没有。时势之外，还要把握时机。春秋末期的谋略家范蠡说：“圣人不考，时反是守”，“时不至，不可强生；事不究，不可强成”，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要“蹶而趋之，唯恐弗及”。只有善于审时度势、把握机遇，才真正可以称得上高明的谋略家。《三略》反复强调“动应事机”，强调“时至而动”，用意正在于此。

第三，知其所止原则。任何事物的发展，总是要遵循“极而反，盛而衰”的客观规律的，老子曾经说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，“祸莫大于不知足”。《三略》也警告人们说：“莫不贪强，鲜能守微，若能守微，乃保其生”，又说：“造作过制，虽成必败”。就常人而言，确实是知进易，知退难的，因而往往陷于其中不可自拔，从而导致物极必反、盛极而衰之悲剧的出现。这就要求必须把握上下进退的“度”，留有余地，知其所止，以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为最佳境界，避免过极失